

经济学与安徽经济

2004

荣兆梓 主编

安徽大学出版社

目 录

1	前言	荣兆梓
1	第一部分 增长与发展	
3	报酬递增理论与苏浙沪皖结构转型比较	江三良
17	新经济增长理论与安徽新经济因素分析	宋 华
32	“减物质化”与安徽的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	汪道明
45	第二部分 企业与竞争力	
47	核心能力与安徽制造业的发展	潘 林
63	波特产业竞争力理论与安徽中小企业发展	余传奇 孙 韦
74	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前沿 理论与安徽实践	蒋长流 胡志强
89	第三部分 农村经济	
91	诺斯的制度理论与安徽农业市场化经营制度的创新	马怀礼
103	外向型农业发展战略与安徽农业发展	杨俊龙
115	税费改革中“逼税效应”的制度经济学解释	张德元
129	第四部分 公共经济	
131	财政风险理论与安徽地方财政风险研究	田淑英
147	公共教育资源配置理论与安徽实证研究	唐祥来
162	法国公共会计体制与安徽会计集中核算的改革	钱海燕

179 第五部分 外向经济

181	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安徽外贸发展	李保民
194	安徽省出口不稳定性的实证分析	胡本田
210	竞争优势理论与安徽科技型出口生产基地建设 ...	夏英祝 王春贤
224	从海外子公司网络嵌入理论 看安徽利用外资新思路	高 茜 徐 蕾 黄 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学与安徽经济 2004 / 荣兆梓主编. —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4.6

ISBN 7-81052-865-3

I. 经... II. 荣... III. ①经济学—理论研究②地区经济—经济发展—研究—安徽省 IV. ①F0②F127.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5984 号

经济学与安徽经济 2004

荣兆梓 主编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合肥市肥西路 3 号 邮编 230039)
联系电话 编辑部 0551-5108438
发行部 0551-5107784
电子信箱 ahdxcbps@mail.hf.ah.cn
责任编辑 鲍家全 徐建
封面设计 张 ☐

印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印刷厂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5.75
字数 258 千
版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1052-865-3/F·72

定价 24.8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前 言

荣兆梓

1. 经济学的发展与经济学人的责任

与现实经济的突飞猛进相类似,我国经济学的研究状况在最近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异乎寻常的变化。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笔者在大学课堂里所学到的经济学,主要是《资本论》和苏联范式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讲计划经济,讲所有制的一大二公,讲按劳分配的资产阶级法权。至于马克思之后一百多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济科学的全部成果,在 4 年学习期间只是以西方经济学讲座的形式开设了一个学期的课程。那时候的经济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表现出封闭、偏执和狭隘的“左”的特征。25 年过去了,回首 25 年前中国经济学的状况,我们不能不为其变化的深刻和进步的飞速而感到振奋。在今天的大学课堂里,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不仅要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课程,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而且还要系统学习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和宏观理论,讨论各种经济学流派的前沿成果和探索性课题。当代中国的经济学不仅变得更加开放、更加现代化、更具包容性,而且毫无疑问地也更加科学、更加接近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现实。

二十余年来,经济学始终在与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互动中前行。这是它生命力的源泉,也是它基本价值所在。现实经济发展表现为国家工业化与经济体制转型两大进程互为前提和相互促进,经济学的发展与之相类似,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自我创新与现代经济科学的引进传播两大过程的互动与互补。全部过程可以大致划分为前后衔接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7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自我创新为主

线,通过对苏联范式的全面批判,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第二阶段从 90 年代初至今,以现代经济科学理论成果的全面引进,及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运用研究为主要内容。这一阶段的经济学发展,特别是宏观调控理论的发展,为中国经济近十年的持续稳定高速增长,提供了成功的理论支撑。总体上看,经济理论发展的两大过程始终互为前提、相互补充,那种把二者对立起来、割裂开来的观点是错误的,不符合理论发展实际的。在今后的许多年里,中国的经济学仍将继续这一理论融合过程,从根本上说,这是现实经济的要求,没有人可以轻易改变它。

根据我国高校的学科分类,经济科学被分为两大部分:经济理论与应用经济学,前者包括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世界经济、数量经济学、经济理论史和经济史等学科;后者则包括金融学、财政学、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国际贸易和劳动经济学等学科,构成一个内容丰富、体系庞大的学科群。由于中国经济正处于改革与发展的活跃期,有两个方面的经济学课程虽然没有构成独立的学科,却特别受到重视和关注:一是关于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增长理论,因为这些课程讨论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对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二是关于制度经济学、过渡经济学和企业理论,这些课程讨论经济体制的转型和产权关系的调整,与体制改革、企业改革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关系,因此也特别受到国内理论界的关注。从长远的意义看,经济学的学科分类不可能是始终稳定和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经济实践的进程和理论研究的发展而重组和整合。与此同时,经济学还和其他社会科学发生着经常的交叉与融合,因而产生出像管理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经济社会学等交叉性学科。由于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较多涉及数量分析,由于经济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以最小投入获取最大产出的效率问题,因而经济学与人类活动的几乎所有方面有关,经济学的方法论正在向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渗透,发展出国防经济学、犯罪经济学、家庭经济学等许许多多边缘学科,以至有人不无调侃地把经济学称作“经济学帝国主义”。

由于经济学学科体制的庞大复杂,由于理论发展继续处于活跃期,由于现实经济的突飞猛进继续要求理论不断创新,经济学的理论工作者始终承担着艰巨的继续学习任务。我们面对着一个经济科学博大精深的理论宝库,我们置身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剧烈变动着的现实环境,我们只有不停顿地向书本和实践学习,不断地更新知识,不断地探索前行,才能真正承

担起一个经济学理论工作者应当承担的责任。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感到,理论发展及其现实运用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时滞甚至断层。国内外理论研究的新成果不能够及时地运用到现实经济,特别是安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中部省区的经济现实,这对我们无疑是重大损失。因此,在感到学习与探索责任的同时,我们也切实感受到传播、推广甚至率先运用的责任。本书的写作动机正与此相关。

在“九五”期间实施的安徽大学“211工程”一期建设中,安大经济学院承担了名为“经济学与安徽经济发展”的重点项目。按照这一项目的规划,我院教师连续5年撰写并出版了以《安徽经济形势与展望》为题的年度研究报告(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2002年),在为地方经济发展献计献策的同时,也锻炼了队伍,增强了我院科研、教学与地方经济的联系,受到了好评。

在“211工程”二期建设中,经济学院继续承担“经济学与安徽经济发展”重点项目的主体任务。为了进一步发挥高校理论研究优势,提升研究层次,把为地方经济服务与前沿理论研究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我们计划自2004年起撰写并编辑出版《经济学与安徽经济》年度研究报告,作为“211”二期建设中“经济学与安徽经济发展”重点项目的成果,并努力使之成为有较高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的“211工程”标志性成果。年度报告由若干个分报告组成,每一个分报告选择对安徽经济现实有重要启迪意义的经济科学的一个新理论(包括新兴学科、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研究成果等),简要介绍其基本内容,运用这一新理论深入地研讨安徽经济的一个现实问题,并力争提出有创见的政策建议。我们希望通过这一途径,能加强和加快经济学前沿领域的研究成果向安徽现实经济的转化。为地方经济服务是安徽大学一贯的办学宗旨,更是我们经济学院教学科研的重要目的。我们希望在“经济学与安徽经济”的研究计划之下,更好地组织和锻炼队伍,发挥经济学院的整体力量,在学习、探索、传播、推广和率先运用的过程中,为安徽经济服务,为安徽经济发展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2. 安徽经济欠发达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安徽省的地理位置实际上相当靠东,按照目前正规的三大地区划分,安徽省虽然属于中部地区,但它也属于中部地区的最东端,皖东一部甚至已经嵌入东部沿海的长三角地区。可惜的是,这种向东突前的地理位置并没有带来经济水平与东部地区的同样靠近。近代以来,安徽与其近邻苏、浙、沪

的经济差异一直在扩大,上海及其周边大都市圈与安徽“乡下”的反差越来越令人注目。至迟到 20 世纪中叶,安徽的经济发展水平就处于中部地区的下游。统计资料显示,从 1952 年到 1978 年间,安徽的 GDP 增长速度年均均为 3.51%,大大低于全国 6.15% 的平均增长速度,根本无法改变自己中等偏下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改革开放以来,安徽的经济发展速度大幅度提升,1979 年到 1995 年 GDP 平均增长速度达到 10.67%,超过同期全国平均水平的 9.79%,非常接近同期高速发展的东部沿海地区 10.91% 的平均增长速度。即使如此,安徽仍然未能摆脱中后的基本位次,特别是按照人均水平计算的位次靠后。2000 年到 2003 年,安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 4 867 元增长到 6 457 元,但在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排名始终维持在第二十二位没有变动,明显处于中间靠后位次,比地处西部的青海省还落后一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叶以来,安徽的经济社会发展速度有趋缓的迹象,反映到城乡人民收入水平上,也出现了增长速度趋缓迹象。1996 年到 2001 年,安徽城镇居民收入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长,人均可支配收入由期初的 4 493.92 元增加到期末的 5 668.80 元,期间增长率为 26.14%,年均增长率为 4.36%,但与全国平均水平的 41.76% 和 6.96% 相比,分别低了 15.62 个百分点和 2.6 个百分点,增长速度明显偏慢。1997 年以来,农民收入增幅下降、“三农”矛盾表面化是全国现象。安徽情况与全国类似,1997 年以后,安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连年下降,1998~2002 年的速度分别为 3%、2%、1.8%、4.4%、4.8%。虽然到 2001 年,安徽农民人均纯收入实现了“超 2000”的历史性突破,2002 年又小幅跃升至 2117 元,但这个令我们全省上下激动不已的数字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甚至比内蒙古、广西这样的边远省份的水平还要低。时至今日,安徽仍然是中部地区经济最落后的省份之一。

经济落后与地理位置向东部的嵌入形成明显反差,这不能不激起安徽人强烈的追赶意识。但是,为什么几十年苦苦追赶不能如愿以偿,甚至连中部地区落后的帽子也不能摘掉?安徽需要更多的理性思考。

一种观点认为,安徽的落后根源于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我省的自然资源虽然不能说特别丰富,但与东部邻省相比,无论是能源矿产资源,还是农产品资源都具有相对优势。安徽的落后首先是由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区域分工不合理,以及与此相关的价格体系不合理。我们为东部邻省提供能源矿产的初级产品,以及极少附加价值的农产品,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恰恰是

这些初级产品的计划价格偏低,因此我们通过地区产品剪刀差的形式,为制造业特别是轻工业产业发达的地区作出了贡献。安徽经济的发展因此而长期受到消极影响。但是,这一观点没有得到 80 年代以后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支持:先是计划价格的放开并没有导致安徽经济的全面提升;再是 90 年代前期安徽以食品、家电为龙头的轻工业曾有过快速发展,但我们未能实现从轻工大省向轻工强省的转化。90 年代后期,由于汽车和房地产业的拉动,我国经济开始向重化工倾斜,安徽经济却未能因此而获得特别的机会。总体上看,中国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地区产业趋同化特征。在每一个发展阶段上,安徽都曾试图追赶产业热点,这样的战略并没有导致安徽经济相对于邻近省区更快的发展。

一种观点认为,安徽经济落后根源于经济体制的落后。由于思想观念的落后,我们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始终比别人慢半拍,因此市场化程度较低,经济体制相对而言更加僵化,投资软环境与邻省相比有明显差距。经济发展受到体制落后的制约。但这种观点和二十多年来安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事实不相吻合。安徽人在改革过程中从来不缺乏勇气和智慧,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小岗村率先起步,安徽人在改革过程中就经常扮演试吃螃蟹的角色。近年来已经在全国普遍推开的农村税费改革,又是由安徽人带头试点,率先推开。不仅如此,我们目前正在把农村税费改革的成果扩展到地方税制改革的其他方面,如在省及地市一级建立国库支付中心,在县一级建立会计核算中心等等。二十多年来,安徽在体制改革方面并不总是落后,至少在政府推动的改革,即所谓“强制性制度变迁”方面并不落后。但改革的率先并没有导致发展的加速。当然,在市场自发的体制转轨,即所谓“诱致性制度变迁”方面,我们是落后于东部邻省的,但这与其说是经济落后的原因,倒不如说是经济落后的结果。以体制落后来解释经济增长缓慢,说服力也不强。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安徽经济欠发达根本原因在于文化与教育。几千年的农耕文化和“小富即安”的传统观念阻碍了安徽的工业化进程,教育事业的不发达和教育投入不足,使我省的劳动力总体素质相对偏低,影响了企业竞争力乃至区域竞争力。此类观点显然有大量现实数据支持,对问题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仔细推敲其推理逻辑,难免仍然有“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疑问。农耕社会的落后文化是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思想障碍,这不仅对安徽,而且对其他任何省区经济发展都存在着消极影响。教育事业不发

达与经济不发达至少是互为因果的,而教育投入不足则部分地应当归因于我们的财力不足。此类观点的解释力看来也是不充分的。

一种理论上可以接受的解释意见是:安徽经济相对于其相邻省区的欠发达,是近代以来历史形成的我国经济区域布局所致。安徽地处长江中下游地区上海与武汉两大都市圈的中间,一直是城市化水平较低、农业人口比重极高的欠发达地区。这种历史形成的宏观区域布局,不是通过一省或少数几省的主观努力就能改变的。而这种历史形成的区域格局,在当前市场化与工业化并进的历史转折关头,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以及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协调,而实现其矛盾和冲突,终于表现为我省特有的经济断层或经济盆地现象。与此现象相关联,安徽经济发展面临一系列尴尬:由于经济的极化效应,稀缺的经济资源大量外流,特别是高层次的技术和管理人才向沿海地区外流,而我们却无力从西部吸引相应的资源;由于竞争力低下,国有大企业不得不更多依靠政府扶持而牺牲市场活力,民营中、小企业则缺少大面积创生的环境,成活率低而成长壮大的可能性更小;由于经济总量偏低,支撑地方公共事业的财力匮乏,从而激化官民争利矛盾,使得民间创业资金更显不足。十分明显,此类问题与体制落后、教育投入不足都有密切关系,可以说是困扰安徽经济诸多问题的症结。

当然,此说是否能够解释安徽经济欠发达的问题,仍然有待争鸣和讨论。但在我们看来,即使这一观点能够成立,也绝不意味着安徽在历史形成的经济格局面前将无能为力、无所作为。正确地认识形势,正确地认识自己,恰恰是发挥主观能动性,把安徽的工作做得更好的前提。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越是在困难的局面下越是可能有更多的机遇,越是勇于直面自己的弱点,越是有可能会激发创造性思维,脚踏实地工作,创造出历史的奇迹。这是关系到六千七百万人民福祉的大事,我和经济学院的同仁们愿意积极参与到这个事业中。这本文集也是我们向给予我们极大信任的安徽父老乡亲献上的一份心意。

3. 本书讨论的主要内容

本书包括 16 篇各自独立的研究报告,所涉及的内容可以分为增长与发展、企业与竞争力、农村经济、公共经济、外向经济 5 个部分。

增长与发展是当代经济不变的主题,但各国的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却是经常地变动着的,而这恰恰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党的十六届三中

全会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新的科学发展观,标志着我国经济在持续二十余年的高速增长之后,正稳步进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本书第一部分3个研究报告在新的科学发展观的背景下,以新颖的视角重新审视安徽经济发展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但也不无争议的创新观点。江三良副教授的《报酬递增理论与苏浙沪皖结构转型比较》一文认为,地区经济业绩差异的原因在于生产要素报酬率的差异,尤其以地区工资差异为要,而这一差异的形成又与一系列经济、政治、文化因素的长期作用有着系统联系。安徽要真正实现与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的一体化,必须围绕促进报酬递增这一主题,推进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尤其是政府职能的转变,为民间创新力量的成长拓展广阔的空间。宋华副教授以《新经济增长理论与安徽新经济因素分析》为题的研究报告,从知识职业、经济全球化、经济动态和竞争、向数字化经济转型以及创新能力五个方面,系统比较了安徽与周边省市的新经济指标,全面地令人印象深刻地描述了我省新经济发展相对于传统经济发展更加落后的状态,既给人以警示,又对我省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具有正面的积极的意义。汪道明教授的意识超前的研究报告题为《“减物质化”与安徽的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指出“循环经济”的关键在于“减物质化”,即经济发展要从根本上减少自然资源的耗费,阻止由线性经济引起的环境退化。这一发展目标理所当然应包含在我省工业化的当前任务之中。报告从宏观上分析了我省经济发展实现“倍数4”甚至“倍数16”减物质化目标的可行性,并且提出了一系列相应的对策建议,对我省“十一五”规划的制定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

企业与竞争力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管理学命题,现代经济学从国家竞争力、产业竞争力和区域经济竞争力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全新的研究。决定区域经济竞争力的因素有要素供给、市场需求、产业支撑等许多方面,但企业竞争力,特别是工业企业的竞争能力仍然是基础。本书第二部分的3个研究报告,抓住我省制造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竞争力这个热门课题展开讨论,在分析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力图提出有实用价值的对策建议。潘林副教授的《核心能力与安徽制造业的发展》,以上世纪90年代刚刚发展起来的企业核心竞争力理论为依据,解读安徽制造业竞争力状况,讨论培养安徽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发展安徽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战略和策略,提出充分发挥文化的软件作用、培养高素质制造业劳动大军、低成本战略与差异化战略并重、实施“走出去”战略等一系列意见和建议。余传奇副教授和蒋长

流副教授分别撰写的两个研究报告都以中小企业为题,一篇题为《波特产业竞争力理论与安徽中小企业发展》,另一篇则为《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前沿理论与安徽实践》,从两个不同的侧面深入讨论了全省上下高度关注的中小企业问题。中小企业的发展,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也就是民营经济的发展,对当前安徽经济的振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两位学者不约而同将研究的目光聚集到这一领域,再一次证明了理论的营养来自实践这一亘古不变的真理。

安徽至今仍然是一个农业大省,农业和农村问题始终是安徽经济的中心话题。本书第三部分的3个研究报告,选择了安徽农村经济中诸多复杂而困难问题中的3个,以独立观察者的视角进行了重新研究,提出了颇具个性色彩的理论观点。马怀礼副教授的文章《诺斯的制度理论与安徽农业市场化经营制度创新》,利用美国经济学家诺斯的“产权—国家—意识形态”一体化理论,讨论安徽农业市场化问题,认为市场化经营制度的创新必须同时从产权制度、政府功能和市场化经营意识的培养三方面入手,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打开了更宽阔的视野。杨俊龙副教授的《外向型农业发展战略与安徽农业发展》一文,适时提出安徽农业走外向型发展道路的重要性和可能性问题,同时指出,我们在这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利因素,特别在品牌和商誉等有关农产品的营销战略上还有不少教训。文章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发展我省外向型农业的一系列对策建议。张德元副教授的研究报告题为《税费改革中“逼税效应”的制度经济学解释》,报告运用安徽农村调查的第一手资料尖锐指出:在基层财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税收任务逐级分解、层层下压的“逼税效应”,在税费改革后仍然存在,甚至更加严重。认为这一现象是国家、官员和公民三方目标冲突下博弈的结果,具有深刻的制度根源。建议在国家取消农业税的5年过渡期内采取妥善措施,稳定农村大局。

公共经济,其主体是政府经济,重点讨论与政府财政收支相关联的一系列经济问题。随着财政体制改革的推进,地方政府的理财能力越来越成为影响地方经济竞争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本书第四部分讨论公共经济问题,有3篇报告入选。田淑英副教授的《财政风险理论与安徽地方财政风险研究》,以前期理论研究的成果为工具,以大量实地调查研究的资料为依据,详细分析了相关的统计数据,深入讨论了我省省级财政规模偏小、增长缓慢、税源分布极端不均衡,县乡财政赤字大、债务重,以及基层财政周转失灵等风险因素,并且研究了风险形成的原因,提出了相应对策。唐祥来副教授

的研究报告题为《公共教育资源配置理论与安徽实证研究》,文章指出,安徽教育资源配置存在流量投入不足、存量结构失衡的现象。主张深化教育投资体制改革,强化政府在公共教育投资中的主导地位,建立教育成本补偿制度,促进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教育协调发展。钱海燕副教授的研究报告《法国公共会计体制与安徽会计集中核算的改革》,以法国公共会计体制为参照系,比较我省会计集中核算改革的实践,认为建立国库单一账户制度为核心的会计集中核算与国库集中支付有效融合的机制,是一条适合我省实际的改革新路。

发展外向型经济是安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本书第五部分包含4个研究报告,集中讨论了这一领域的一些重要问题。李保民副教授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安徽外贸发展》一文,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出发讨论安徽外贸发展的现实差距,特别是面对绿色壁垒和社会壁垒等新贸易壁垒,我省外贸所受的影响和冲击,有针对性地提出一系列的对策建议。胡本田讲师撰写的《安徽省出口不稳定性的实证分析》一文,利用国外有关出口不稳定性研究的计量分析方法,对我省1995年以来外贸出口额变动进行实证分析,讨论了影响我省出口不稳定的诸因素,并提出降低出口不稳定的若干对策。夏英祝副教授等人的研究报告题为《竞争优势理论与安徽科技型出口生产基地建设》,从提升竞争优势的视角讨论我省科技型出口生产基地问题,认为科技型出口生产基地建设应发挥产业集群效益,明确政府的角色定位,借鉴波特的钻石体系模型,培育生产基地的竞争优势。本书的最后一个研究报告,是高茜副教授撰写的《从海外子公司网络嵌入理论看安徽利用外资新思路》。此报告从一个新的理论视角讨论利用外资问题,指出东道国当地商业网络状况以及子公司嵌入其中的知识获取能力,对跨国公司投资区位的选择有重要影响。安徽有必要从这一视角重新审视利用外资规模和绩效双落后的原因,通过政府、行业协会、企业等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提高区位吸引力和引资绩效。

作为集体劳动的成果,本书在发挥集思广益之优势的同时,也难免有文字风格不统一,甚至理论观点不一致的缺点。为克服此类缺陷,同时也为突显经济学理论与安徽经济实践相结合的特点,本研究计划实施之初,就为每个子课题制定了“运用一个新理论研讨安徽经济一个现实问题”的统一目标,并且提出:“课题的选择应注意以下要点:①努力了解本专业学术动态,‘新理论’应当确实反映国内外经济科学的前沿,从而保证研究的新颖性;

②)所要讨论的现实经济问题应当有足够的重要性,能引起决策者的重视,但又应当避免大而无当,不能在一个研究报告的篇幅内处理;③理论的选择应当和现实问题研究紧密结合,所选‘新理论’应当恰好适于研究所要研究的现实问题,并且能够得出用其他理论方法难以得出的重要结论;④政策结论应当有现实可行性。”现在,全部研究成果已经呈现在读者面前,我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自己提出的目标,首先要请我们的读者给予评判。我们知道自己的差距,我们知道各个分报告无论在研究深度还是在文字把握上,都存在参差不齐的问题。我们愿意倾听大家的批评,我们希望吸收大家的意见,改进我们的研究,把明年的报告做得更好。请允许我代表经济学院的同仁们,向始终如一支持和鼓励我们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2004年3月12日

作者简介:

荣兆梓,1949年生,男,汉族,江苏无锡人,大学本科,安徽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院长。主要研究方向: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企业理论。

第一部分

增长与发展

报酬递增理论与苏浙沪皖结构转型比较

江三良

[内容提要] 安徽省与苏浙沪同属一个经济区域,但经济增长业绩存在显著差距,这种差距的产生并非出于偶然,而是与一系列经济、政治、文化因素有着系统的联系。引导资金、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在地区间流动的核心动力是要素投入报酬率的差异,安徽要真正实现与长三角经济圈的一体化,惟有消除要素报酬上存在的差异,致力于促进报酬递增的实现,而一系列制度创新,尤其是政府职能的转变,为民间的创新力量松绑是促进报酬递增的源泉。

[关键词] 经济增长 报酬递增 融入 长三角

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增长业绩,这种增长业绩是与快速的工业化进程分不开的,而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呈现出地区间极其不同步的状况,也因此导致了地区差距的逐渐扩大。研究中国地区差距的规律,可以发现,中国的地区差距不是呈现直线的缩小或扩大趋势,而是表现为20世纪80年代前、中期短暂的缩小和90年代后持续扩大的趋势。范剑勇和朱国林(2002)通过将地区差距分解为地区经济结构转型速度的差异,证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区差距持续扩大是由非农产业及第二产业的高产值份额在空间上的不平衡分布所致。也就是说,东部沿海地区日益成为以轻工业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生产为主的制造业中心,中西部地区则逐渐沦为以农产品、矿产品和低端工业品生产为主的外围区域,即所谓的东部沿海—内地的“中心—外围”格局。考察安徽与浙江经济增长业绩差距的形成与扩大历程,我们发现,我国东中西部产业分工这种格局的形成基本上可以说是市场化条件下的自发结果,与各地区初始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

构状态似乎并没有很大的相关性,与各地的自然资源禀赋也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试想一下在改革之初的 1980 年,浙江省的 GDP 总量是 179.68 亿元,在全国排名第 12 位,安徽的 GDP 总量是 140.88 亿元,在全国排名第 13 位,两省差别并不显著,且浙江在自然资源、国家政策方面并不比安徽优越,同时,我国历来就有产业结构趋同、雷同的问题,开放之初,苏浙沪在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上也并不比安徽具有明显优势。造成这种不平衡格局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本文试图通过分折地区经济结构转型差异,来寻找导致安徽与苏浙沪间地区差距形成的一些经济因素和制度因素。希望这里的讨论能够对安徽下一步经济增长战略的选择有所启示。

2. 地区差距演变规律的理论解释

从威廉姆森的研究成果中,我们知道,美国地区差距在历史上经历了一个典型的倒“U”形曲线,其波峰大致出现在 20 世纪早期。对于这种地区差距演变规律的解释,在经济学研究中,一直有两种对立的观点:比较优势理论和报酬递增理论。

地区收入与结构转型的内在联系可以用下式表示。假定一国存在两个地区和两种生产要素,即劳动力与资本,地区个人收入(PI_i)的表达式为:

$$PI_i = (w_i L_i + r_i K_i) / L_i = w_i + r_i (K_i / L_i)$$

其中 i 为地区 1 或 2, w_i 和 r_i 分别为各地区劳动力价格和资本利息, K_i 和 L_i 分别为各地区资本与劳动力数量。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当两个地区市场处于分割并导致生产要素流动不畅的情况下,地区收入差异既取决于不同的要素价格,也取决于不同的资源禀赋结构。在零运输成本的理想状态下和两个地区市场完全统一时,地区间的劳动力价格和资本利息相等,此时地区的个人收入仅取决于不同的资源禀赋结构。因此,从理论上讲,两个地区在市场没有统一和存在要素流动壁垒时,地区差距取决于要素价格差异与资源禀赋差异。在两个地区市场统一并消除了要素流动壁垒时,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两个地区要素价格将迅速达到相等,此时地区收入仅取决于资源禀赋差异这一单一因素。在分析美国地区差距与结构转型的关系时,比较优势理论就是假定美国地区间不存在要素流动的壁垒,工资与利息在各地区都相等,因此,地区收入仅取决于产业结构(K_i / L_i)。由此判断,在 20 世纪初期以前,整个美国处于快速的工业化之中,表现为农业产值份额及就业份额显著下降,而制造业产值份额、就业份额趋于主导地位,此时地区产业结